

历代名人名简



官场醒语

——政事篇

王兆祥 /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历代名人名简

官场醒语

——
政事篇

王兆祥 /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杨 文

复 审:白小平

终 审:张彦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官场醒语:政事篇/王兆祥主编. —太原:山西
人民出版社,2003.1

(历代名人名简)

ISBN 7-203-04634-6

I. 官... II. 王... III. 名人-书信集-
中国 IV.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863 号

官 场 醒 语

——政事篇

王兆祥 主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70千字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203-04634-6

K·289 定价:15.00元

序

这样一部颇具规模的《历代名人名简》摆在面前，在进行书信佳构的鉴赏之前，我们先就书信的名称演变、文体功用、美感特性及发展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做一个概略的了解，进行正名、辨体、审美、述史等方面的讨论，以便我们在鉴赏的过程中有必要的知识储备。

什么叫书信？有事相告，却因地域之隔不得面述，或因其他缘由不宜面述，而以书面文字相寄，这样有专致的受读对象、一般用散文形式写作、并遵从一定格式的文字，我们把它叫做书信。刘勰《文心雕龙》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就是说，把想要说的话写在简册上，于是语言变成了文字，这正是“书”的原始含义。“陈之简牍”的“陈”字，即以简牍上的文字相“陈”的意思，如此，则刘勰的释义就已包含了书信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古人对书信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形成了关于书信的种种异名，如“书”、“简”、“札”、“启”、“笺”、“帖”、“表”、“疏”、“函”、“上书”、“奏议”、“封事”、“尺牍”、“尺素”、“尺翰”等等。形成这么多名称，

原因各别。有的因其书写工具、材料或方式而得名，如“简”、“帖”、“笺”、“札”、“牍”系以竹简、木板或绢帛为刻写材料；“尺牍”、“尺素”、“尺翰”，则因所用绢帛、简板长约一尺；因有封套而称“函”；欲密奏为防泄露而封板称“封事”；若欲高树讨伐之旗，抑或出师获胜报捷，便“书辞于帛，建诸旗杆之上”，“露布不封，播诸视听”，这种有如今之公开信的文字，则称“檄书”，或称“露布”。徐思曾《文体明辨序说》释“檄”曰：“《释文》云：‘檄，军书也。’《说文》云：‘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以号召；若有急则插鸡羽而遣之，故谓之羽檄，言如飞之急也。’古者用兵，誓师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辞；而檄之名则始见于战国。《史记》载张仪为檄以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是也。后人仿之，代有著作。”起初，“檄书”亦可称“露布”，后来渐有分工，大概是告伐则称“檄”，告捷则称“露布”。

有不少名称则是因为在特殊的通信对象之间，要把尊卑上下的相互关系表示出来。语言是符号，语言是文化，在以森严的等级结构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许多词汇概念渲染着浓厚的等级制的封建色彩，书信的很多名称就是如此。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云：“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负宸，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皇帝的诏策，有的属于对象广泛乃至于号令全国的公开文件，有的则是给某一臣下，因而具有书信性质。因其语言也神，故其称谓也别。故《文心雕龙·诏策》又云：“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允好。”是说皇帝君王发布的命令，应该万分崇敬，所以尊称为“诰”，即使不过只言片语，亿万百姓也要齐声唱好。帝王的御笔书札（或为代笔），名称也有演变而代不相同。大约在轩辕、唐尧、虞舜时期统称为“命”。夏、商、周又有了“诰”、“誓”的名目，“诰”以施政，“誓”以治军，“命”以授官。到了战国时代，又并称为“令”。秦始皇统一天下，把“命”改称“制”。汉朝建立，在制订礼仪时，将“命”一分为四：一种叫“策书”，“策者，简也”，专以封侯赐爵；一种叫“制书”，“制者，裁也”，专以发布敕令；一种叫“诏书”，“诏者，告也”，专以告谕百官；第四种叫“戒敕”，“敕者，

正也”，专以警戒各州各部。其后各朝，多在这样称谓中选择用之。此外还有一些名目，如“谕告”或“上谕”，《文体明辨序说》云：“谕，晓也；告，命也。以上敕下之词。”春秋时代天子谕告诸侯列国，多系使人传言，而不假书翰，至汉朝以后或以文字行之，乃成一体。又如“玺书”，或称“赐书”，“天子之书，用玺以封”，故称。唐代还创造了一个“批答”的概念，专门用来指称皇帝对臣下奏章的批答之书。宋朝不甘落后，又发明了一个“御札”的名词，来表示对天子之短简的尊敬。

“以上敕下之词”有这么多的特称，以下达上的文字自然也是名目繁多。《文心雕龙》云：“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后两句是说诸侯百官在朝拜时向天子陈述意见，天子则借听政的机会考察诸侯百官的才能与政绩。起初群臣议政，多在廷议中讨论，以口头形式当面陈述，后来逐渐演变成把那些比较繁难而重要的问题撰为文词、书之简牍以进的方式，百官平日偶有所见，亦常以简牍即书面文字进献君王，遂成“上书”一体。“上书”，《文心雕龙》以“章表”、“奏启”、“议对”而分论之，姚鼐《古文辞类纂》则总为“奏议”，而称“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但观其“书说类”之选文，亦多上书。《文体明辨序说》亦云：“按奏书者，群臣论谏之总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这比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分出“论谏”、“奏书”、“议”、“弹文”数类，在性质上似乎更具归纳性。《文体明辨序说》还在“奏疏”的名目下附以“奏对”、“奏启”、“奏状”、“奏札”、“封事”、“弹事”等内容或有差异的异名，“上书”、“章”、“表”、“笺”则仍各另列。这些异名也有一个形成过程。战国以前，帝制未立，本没有如此多的特殊称谓，只统称“上书”。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便改“书”为“奏”。汉朝既立，又重定礼仪，于是有了用以谢恩或报告灾异的“章”，用以按劾或上事的“奏”，用以陈情的“表”，而以“议”发表对朝政的不同意见。魏晋盛行“启”，唐好称“表”、“状”，宋元损益前制，而奏事多称“札子”。但据徐思曾言，“札”“有叠副提头画一之制，烦猥可鄙”，大概自卑恭敬过度，有损人格，故后世儒士“鄙而不屑”。

等级文化在书札名称的表现上有时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如“笺”始于东汉，本来太子、诸王、群臣皆可以称，但后来规定上书天子才能称“表”，上书皇后、太子、诸王的书札则称“笺”。“笺”表示出了天子与皇后、太子之间在等级上的微妙差异，而给其他人的书札就不复使用“笺”这个曾经通用一时的名称了。又如两汉无“启”，原来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皇帝的名字用过的字，在字典里就被圈出，万民莫敢再取，除非江山易姓。看起来，文化专制还伴随着语言专制。

上面列举了这么多异名别称，并略加分析，其实概括起来，还是“书”的概念最具包容性。《文章辨体序说》云：“昔臣僚数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统一的概念比较规范，而异名除了明尊卑上下之外，还往往别有趣味。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古代文人为求名之古雅，似乎特别青睐一个称谓，那就是“尺牍”。

“尺牍”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典籍，司马迁的《史记·仓公列传》云：“缁紫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又《汉书·游侠传》云：“（陈遵）贍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后世文人辑其书札或选编书体文字，亦喜以尺牍名集，如周亮工《尺牍新钞》系集明末清初文人短札，《秋水轩尺牍》则是清末许思涓自己的往来应酬之作成集。尺牍既指其短，如《历代尺牍小品》，专收小简之美；也已成为一切书简的代称，如今人贾植芳、李东所编《历代名家尺牍新钞》就不论长短，惟佳是取，皆其宜也。

本书所选，已及近代。而民国以后，“书”、“简”、“札”及上述各种原因形成的异名皆渐消失，只在人们追求文字的古雅风格时间或言及，往来文字不再单称“书”字，而以“信”字代之。“信”指称往来文字，古已有之。晋王羲之《杂帖》：“朱处仁今何在？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又《南齐书·张敬儿传》：“得家信云，陛下有废立之事。”皆可为证。但使用并不普遍。

二

书信体文章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人类发明文字以后，既有地域之隔，自有信息之阻，则必有书牒之达。查先秦的各种典籍，唐尧禹舜夏商周时期已有某些文字即是书信，则上古书牒文献，犹有存焉。姚鼐《古文辞类纂》序其“奏议类”云：“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谏诤之遗，学者多颂之。”序“书说类”又云：“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春秋战国时代，书札渐多。这个阶段的书信多系公文，或为王公大臣之间讨论政务，或为列国诸侯之间办理交涉，或为上之政令派使者持书简下达，或为下之政情以文札上报，还有很多书信乃是谋士们的游说之词。故此际书牒的产生频率，与政治的繁忙程度成正比，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因言：“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

先秦的书牒文风刚健而又颇具情采，且极善修辞，颇堪品读。如燕惠王《以书让乐毅且谢之》、羊舌肸《治郑子产书》、范痤为逃杀身之祸而作的《献书魏王》与《遗信陵君书》、历数吴王“大过六也”的文种《矢书答吴王》、荀卿《与春申君书》等，皆极可读。燕将守聊城，田单久攻，岁余不下，鲁仲连作《遗燕将书》射进城中，燕将立即罢兵，其效力之神速可知。

秦国一统天下，建立封建制度，但却是个短命王朝，也没有留下多少文字。但李斯的写作多少为秦朝捡回一点体面，而李斯最为后人称道的恰恰是他的书牒文字，《谏逐客书》成为历代选文者必选之名篇，而其《狱中上书》以及终被腰斩，不免令人惋其言也哀。

两汉时期，由于书写材料的进步，纸简绢帛并用，书札日繁，而且

不但公牍更多，私函也日益普及，成为文人交流思想、沟通信息的工具。秦汉奏书，往往是秦汉政论散文的杰出代表，有不少流芳千古。长篇如贾谊《治安策》（或称《陈政事疏》），宏论滔滔，气高辞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赞为“鸿文”，并称其《上书请封建子弟》、《论积贮疏》等也是“疏直激切，尽所欲言”的杰作；晁错《论贵粟疏》、《上书言兵事》等文，则有切实深致之长。鲁迅论及贾谊、晁错的策疏云：“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邹阳的长信《狱中上梁王书》风骨凛然，慷慨陈词，又有谋篇设喻之妙，令梁孝王读后立释之而奉为上宾；枚乘的《上书谏吴王》语重心长，且以赋体为之，或偶或排，妙喻连篇，又时时用韵，读来颇具感染力；东方朔的《上书自荐》，则是一篇有游士之风、有滑稽之趣的奇文，在奏书文中别具一格。此外，司马相如、公孙弘、徐氏、刘向、路温舒、石庆、贡禹、刘歆、扬雄、皇甫规、陈蕃等，都有精彩的奏议文字传世，为许多书体文选家所青睐。他们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奏书文体在两汉尤其是在西汉时代的辉煌。

与此相应，亲朋故旧之间的书信，则以其强烈的主体情思、个性意识和个人风格，开辟了书信文学的另一天地，其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平似更令人瞩目。两汉时期的书信杰作，最具代表性的当首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因替兵败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触怒武帝，惨遭腐刑，身心并受奇耻大辱。太始四年（前93年），曾经写信告诫司马迁“慎于接物，推贤进士”的朋友任安也因事下狱，触发了司马迁埋在心底的痛苦记忆，于是写了这封情辞愤激的书信。描其受辱之后的心理状态则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多么真切，多么悲凉。而其“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论，又振奋了多少身处逆境的志士仁人。

与《报任安书》堪称姐妹篇的是李陵的《答苏武书》，羁留匈奴的李陵接到苏武的劝归信，百感交集，他在信中以裹血带泪的文字，述说了汉朝贰臣置身异域的凄凉生活和痛苦无奈的复杂心情：“凉

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每一念至，忽然忘生。”李陵之降，本出无奈，情有可原，汉朝却诛杀其母弟妻子，实属残忍，故李陵在信中列举汉朝对功臣赶尽杀绝的事例，以“陵虽孤恩，汉亦负德”的态度表示了不归之心。这封信文随意转，忽而悲风惨烈，忽而直言慷慨，忽而旧友情深，情韵十分丰富。此外，司马迁的外孙杨惲的《报孙会宗书》，以淋漓痛快之笔，写自己获罪免职后无忌无恐的自娱生活，塑造了我行我素不畏权贵的人格形象。后来汉宣帝得到此信，杨惲竟被腰斩，遂成为封建专制社会文字狱史上惨烈的一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书信体文学也随之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契机。《文心雕龙·书记》描述当时文人竞相在书牍中显示才华的盛况说：“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书，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其实当时的书札尺牍之才，远不止阮瑀（元瑜）、孔融（文举）、应璩（休琏）、嵇康、赵至、陈遵、祢衡等人，不但“三曹”及“七子”中多有此才，其他文人也多擅此道，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文人都把书札当做一种文学体裁来写作。他们不仅以之议政事、论学术、通信息、荐人才、叙情谊，还借此骋文学、露才情、草华章，甚至将山水风光也写了进来，书信体文学于是有了更加广阔的题材领域和更加丰富的美学蕴涵，同时也与诗赋等纯文学体裁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

魏晋南北朝的书信，就奏议文字来说，表章书记一类可称独具风采。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既是荐贤，又是救友，因而情辞恳切，颇为动人，其《荐祢衡书》则“飞辩骋辞，溢气坳涌”，《文心雕龙·章表》赞为“气扬采飞”；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的公开信，表现了他清峻通脱的人格和沉雄俊爽的文风，时出豪言壮语，令人震服；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乃援笔立就之作，扬厉铺张，痛快淋漓，令曹操一读毛骨悚然，头风顿愈；曹植《求自试表》则以情文并茂之笔，一抒压抑愤懑之

苦，《文心雕龙·章表》因云：“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诸葛亮的《出师表》言出肺腑，不假雕饰而文采自彰，遂传千古；李密的《陈情表》真情朴美，与《出师表》相互伯仲，亦成不朽名篇。

章表书奏时有不朽文字，一般书札更多美文珍什。曹丕《与吴质书》缅怀故旧，论人论文，宛转情深，给书札的文学化与抒情性以极大影响；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刚肠直言，蔑视礼法名教，敢“非汤武而薄周孔”，嬉笑怒骂，揶揄挖苦，堪称奇文；刘琨有不少书札受人称道，其《答卢湛书》得骈散相间之美，读其“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等句，忧患之情，感人至深；陶渊明教导儿孙辈的《与子俨等书》，则其志趣又别，平淡高远。还应该提到的是以书法家名而其文名遂掩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其实也是尺牘妙手。羲之的书札，或论政事，或言情志，皆有佳制。二王又有很多杂帖短简，多写家事亲情或往来赠答，书于素帛，寥寥数行，摇荡情生，与其挥洒精美的书法相互辉映，另具审美价值，更加令人珍视。

随着骈文在六朝的兴起，骈偶之风也吹进了书札，于是一批工丽华美雅致的抒情小简应运而生。当时文人受绮靡文风的影响，一味追求文笔的华艳，而有忽视内容的倾向，以至有些文章锦绣满眼，却不堪卒读，但抒情小简中也确实有不少精美的制作堪诵堪传。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既是以骈体写信，又是以书简写景，笔下山川奇丽，文字锤炼精工，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力。其《请假启》告假回家当泥瓦匠，修葺“上漏下湿”的破屋，则质言朴语，别具一格。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句，把江南春光写得美丽动人，令陈伯之惻然思归。刘峻《追答刘秣陵诏书》系得刘沼生前未及发寄之信而作复，故属词凄楚悲凉，“青简尚新，宿草将列”，发人深慨，答已故者书亦是创格。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则全篇写“山川之美”，使人叹“得此一书，何谓白云不堪持赠”。吴均《与宋元思书》亦工山水，评者有“扫除浮艳，澹然无尘，如读靖节《桃花源记》”之赞，其《与顾章书》亦堪当此誉。祖鸿勋《与阳休之书》也以写山水胜景著称。这些写山水之美而寓情其中的骈体小简，与六朝山水诗一起，

开创了文学史上新的审美境界。至于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伏知道《为王宽与妇义安主书》、庾信《为梁上黄侯世子与妇书》等代人致妇的“香奁绝作”，“艳极韵极”，“凄绝媚绝”，虽属卖弄文技，而又何尝不是情爱美的一种开掘，打开了古人感情生活的一扇窗户，议之则可，弃之可惜。此外尚须提及的是，六朝诸帝及王子，往往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如梁武帝萧衍、梁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等，皆好文学，其诏敕简札亦有美者堪传。

六朝的美文之风其末流至于浮艳，至初唐尚有影响，直到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以散体抵制骈文，以充实的内容取代夸繁竞艳的词藻，书体文学又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不过韩愈等人所标举的载道文学观，其负效应是文人的心灵受到压抑，书札的实用性增强了，内容也丰富了，但性灵文字、趣味文字、闲情美文相对就少了。不过唐朝毕竟是文学盛世，大师如林，其书札还是往往受人称道。如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拒绝征请，戏笔狂狷，“意疏体放”，机趣盎然。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感今怀旧，眷念情深；《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则词锋锐利，气势逼人。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写山居清趣，令人神往。李白《上韩荆州书》是一封请求荐举的信，豪语夸张，激扬文字，较东方朔《上武帝书》更觉高迈。韩愈《与孟东野书》、《与崔群书》皆至友谈心，文从字顺，情挚语朴；其《应科目时与人书》作于已举进士却无官职之时，虽系求荐，却出语不凡，至今脍炙人口；《答吕翳山人书》则极其擒纵抑扬之能事，足称大师手笔。白居易《与元微之书》为其被贬江州司马心情苦痛时致友，时发哀号，悱恻动人。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得李翰林连致二书问候，遂作《与李翰林建书》答谢，文中述其流落病弱之苦及心灵之衰倦，如“时到幽石好树，暂得一笑，已复不乐”等句，令人悲不胜读；而其《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却别出心裁地贺人遭灾，反更慰人，其中情理，值得玩味。李商隐《上河东公启》乃作者于妻亡子幼之际拒人赠妾之函，亡妻之痛，溢于言表，“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每嗟漂泊”等句，用典又兼行骈，却自然流畅，具有独特的感染力。

唐代书札，颇多论文艺、论学术、论政治的杰作，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韩愈《答李翱书》、《答刘正夫书》，裴度《寄李翱书》，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皇甫湜《答李生第一书》、《第二书》、《第三书》，杜牧《答庄充书》、《与人论谏书》，李商隐《上崔华州书》，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等等，以书信而论学理政事，俱成佳制，两皆可传。

两宋时期也有很多文艺书简，但因两宋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国是日非，文人不得不卷进政治的漩涡，因而政论性的书简更引人注目。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乃一初入仕途的才子向身居高位的司谏官大张讨伐之旗，为范仲淹直言遭贬鸣不平，怒斥高司谏身为言官却不主持正义，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其理也直，其胆也壮，其文也奇，适足当黄庭坚之赞语：“可以折冲万里。”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则以不足400字的篇幅，驳司马光3400余字的长信，把反对新法的言论驳得体无完肤，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宗泽在昏君奸臣一味妥协投降误国的非常时期，曾连上24封《乞回銮疏》，激切感愤，可惜昏君皆漠然置之，后来乾隆读之，叹曰：“是尚得为有人心哉！”岳飞《南京上高宗书略》，表现了一位著名爱国将领的远见卓识和耿耿忠诚，其为文亦道劲顿挫之至。爱国诗人陆游有《知严州谢王丞相启》，危难之痛，忧愤之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宋朝终于灭亡，谢枋得一封《却聘书》，却还表达着遗民的孤忠。我们读两宋的书信，也就读了两宋的历史。

宋代是中国散文发展史的重要时期，人们惯称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占了六位，且皆善书札，苏轼尤其是尺牍大师，黄庭坚也是高手，此外不必一一列举的还有不少。元代时近百年，蒙古入主中原，文坛风气又为杂剧、散曲所转移，故散文整体成就不高，但王世贞“元无文”的批评还是过于极端，元代的书札也还能时见佳作，本书所选者，可以略见。

明代前期和清代中后期，封建专制统治特别严酷，文字狱骇人听

闻，学界和文坛因避祸而趋于实学，书信体文学的成就不能不受到影响。但是明末清初近百年间，却是尺牍小品的黄金时代。受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文学浪漫思潮的巨大影响和感召，进步文人对专制正统文化的疏离意识愈来愈强烈，他们对于官场的腐朽本质和社会的黑暗状况以及自身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清醒，因而要求复归自我，保持个性自由，追求人格独立。他们当然还不可能设想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没有力量推翻现世的专制统治，但他们却可以在与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者的通信中，相对安全地放胆谈心，抒写性灵，于是蔚为风气，造成尺牍小品名家如林、妙品迭出的繁盛局面。李贽是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杰出理论代表，也有不少具有思想活力和艺术魅力的尺牍佳作。徐渭、汤显祖是这场小品文运动的思想代表和重要作家，读其文集中的尺牍往往触目而喜。袁宗道、袁中道、王思任、陈继儒、屠隆、钟惺、谭元春等都是风气中人，时见尺牍佳作。袁宏道和张岱既是一代小品文大师，也是尺牍妙手，他们在尺牍小品特有的情韵和灵趣方面，攀上了更高的美学境界。有一位宋懋澄似乎也应该特别一提，他的书札喜以三言两语成篇，思想精警，趣味深淳，是尺牍小品中极短小又极耐玩味的珍异。有些作家似乎较难列入性灵文学的潮流，但却有传世书札成为散文名篇，如宗臣属于复古派“后七子”中人物，他的《报刘一丈书》以漫画笔墨勾勒无耻文人巴结权门奴颜婢膝的丑态，世相一日不缺此景，则此文必当传之；又如明末少年烈士夏完淳遗有《狱中上母书》和《遣夫人书》，情辞惨烈，亦成尺牍绝品。

清代前期的尺牍文字承晚明余绪，仍然保持了比较繁荣的局面，却在森严的文禁中渐渐失去性灵的光彩，直到后来天下文章归于桐城，“清真雅正”成为御定文风。不过清代历时既长，作家又多，初期有一批进步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后来也还有许多文人努力保持思想活力，在书信的艺术性方面也有自觉的追求，所以还是传下来一大批书札杰作。金圣叹乃明末清初文坛之怪杰，他的信札颇有意新语辣的特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不但在思想史上名标千古，他们的书信也

多有佳作。戴名世事实上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但他的思想和文章却是劲健雄奇，今所传之《戴名世集》载其信札19篇，读之皆有生气，其《与余生书》竟因语犯清忌而导致惨烈的“《南山集》案”，作者为此被斩首，并牵连三百余人，这在书信写作史上不能不重重地记上一笔。孔尚任十分重视尺牍文体的文学性，他甚至说：“人但知词为诗之余，而不知尺牍亦诗之余也。”他提高了尺牍的文学地位，他自己的书札当然也很讲究了。号称画、诗、书三绝的郑板桥，不少家书亦成珍奇，真气贯注，意趣横出，时有狂语诙谐，亦令人雅赏。袁枚在乾隆盛世重倡性灵，其才情亦常借书简而发，成为清代的尺牍大师。龚自珍以其议论风发的诗文开拓了近代文学的新格局，他的笺札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批判精神。曾国藩家书百余万字一千四百多封，广论修心、治学、谋政、治军、持家、教子，社会、历史、人生，莫不涉及，实已成为一大文化奇观，不仅吸引一般读者阅读，且值得学人从各个角度深入研究。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为《曾国藩家书与现代人生》的专著“题词”，即称曾氏家书为“近世一大奇书”，并说：“百余年来，竞相购读者，代不乏人。职以为法而成大业者，亦大有人在。或为政坛强人，或为军界渠帅，或为学苑名流。海外智者盛赞《莱根谈》之不俗，又慕《孙子兵法》以行商战，殊不知曾氏家书可沾溉世人者尤夥……固不当等闲视之。”清末洋务运动的著名人物张之洞没有留下曾国藩那么多的信札，但他写给留学国外之子的几封《致儿子书》，却成为选家常收的名篇。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数年间有家书84封，1962年中华书局将其影印线装，其夫人汤国梨《序言》说当时“除国际友人，往访需持警厅凭证，书信往还必须检查，而于家书尤为严密”。“顾余之珍重此家书者，期与先生相见时，作共诉甘苦之凭证；留示子孙，使知先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气节；传之社会，可观专制统治之蛮横暴戾。然则此家书亦史书也”。此外，清末的著名志士学人如林则徐、谭嗣同、梁启超、王国维等都对书牍文学有自己的贡献。而林觉民的《绝笔书》与夏完淳的《遗夫人书》相比，情皆感人，但夏完淳毕竟只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前朝忠臣，林觉民却是一位以生命去创造新时代

的革命者，其文化位差和思想境界又隔天壤。近代著名学者缪荃孙所辑的《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当时名流 157 人与之论学之书简，对清末民初四十余年间的文化与学术广有涉及，亦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文言为语言媒介、以传统审美趣味为追求的尺牍文学渐近尾声，而以白话文传达新思想的现代书信文学蓬勃发展起来。现代文学大师如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冰心、丁玲、巴金、俞平伯等，还有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学者文人，谱写了现代书信的崭新历史，形成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的书信已经辑成专书，如鲁迅、巴金、丁玲等。鲁迅的书信大致上仍是杂文风味，时露辛辣，保持着思想斗士的风采，其《两地书》之“序言”有云：“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点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他的平凡罢。”又说：“常听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数敷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书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家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这些话，研究书信的人不能不认真品味。其实，读鲁迅的书简，总觉得隐隐似有风雷。比较起来，巴金的书信集似乎才真是“平凡”的滋味，真诚随意而亲切。冰心的著名书信体散文集《寄小读者》，以“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情调，写人生感触、异域风情，成为真与爱、善与美的结晶，滋润过多少读者的心灵。20 世纪 30 年代缪崇群的一本书信体散文集《寄健康人》，以一个肺结核患者的感伤心灵，向健康人倾诉哀曲，批判了当时病态的社会，寂寞哀怨中时有利笔讽世，读之使人动容。《丁玲书简》收 1928 年到 1985 年书信 89 封，涉及广泛，史料价值

之外，颇有一些可做优美的散文来诵读，语言真诚质朴。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最值得推崇的书信集不能不首举《傅雷家书》。这位令人敬仰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为了把儿子教育成“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的”，给远在异国的儿子写了百余封书信，表现了作者“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高洁人格，而且显示出丰富的艺术家的才识睿智，成为一部道德与人格修养、艺术与美学修养的上佳读物。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书信和书信体文学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写作时代，如果系统地整理一下近二十年的书信文献，我们必将惊叹它的富饶。伴随我们民族的不断进步，书信体文学也必将更加健康地走向未来。

三

书信写作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历代书信累积起来，又形成了一座蕴涵着丰富价值的文化富矿，可供后人不断地挖掘。大概言之，历代书信的累积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历史文献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两个层面。

书信首先是一种应用文体，是人们运用书面语言进行人际交流时最熟悉、最常用、最普遍的方式之一。作为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传递媒介和信息载体，它涉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及。研究中国的历史，无论是政治制度史、经济发展史、科学技术史、思想发展史、文化教育史、朝代变迁史、宗教演变史、民族关系史、对外交流史，还是文学艺术发展史、文学艺术批评史、语言文字演化史、社会风俗变迁史、民族精神生活史，总之，历史科学的各个分支，都须使用书信文献，都可以在历代书信的矿藏中挖掘出丰富的实证，或者清理出